

● 社会学

张力的度量

——以“朝珠花的传说”为例对国家与民族社会关系的研究

朱炳祥

(武汉大学法学院, 湖北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朱炳祥(1949-), 男, 江苏靖江人, 武汉大学法学院社会学系教授, 主要从事社会人类学研究。

[摘要] 神话传说是人类本质的符号表述, 白族的“朝珠花传说”显示的国家与民族社会之间的张力关系表现为: 在空间维度上, 当国家权力出现掠夺性下沉时, 国家与民族社会处于对立关系之中, 双方互残互伤; 反之, 则形成整合关系, 国家与民族和谐互动发展。在时间维度上, 当现代国家排斥民族文化传统, 国家与民族社会亦形成对立关系, 传统与现代断裂; 反之, 则形成整合关系, 民族传统适应国家现代化发展。

[关键词] 国家; 民族社会; 张力; 度量

[中图分类号] C91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81X(2004)01-0097-06

现代化进程在政治领域中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就是国家权力向基层社会的下移, 这种下移形成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张力。“张力”一词, 其义为相互之间的牵引力(英文对应词为“tension”), 如果国家没有牵引力, 就不能拉动地方社会发展, 现代化的目标也就不能达成; 但如果张力过大, 地方社会则无法承受, 文化亦易出现与传统的断裂。因此, 张力的度量, 不仅是现代民族国家建设中政治家们思考之为政艺术, 更为研究变迁的人类学者和研究转型的社会学者应该承担的共同研究重任。

神话传说是人类本质的符号表述, 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在其中得到集中的体现。本文通过对发源于云南省大理市喜洲镇周城村现仍流行于白族广大地区的“朝珠花传说”的分析研究, 探讨和度量国家与民族社会之间的张力关系的适度范围。^①

—

关于朝珠花的传说, 我共收集了7个变体^②。第一个变体出自明代段福的墓志铭^③, 内容如下:

石林郎世袭云骑尉拟谥文庄先生寿山段公墓铭

公讳福, 字寿山, 姓段氏, 乃九隆族之后。世为大理簪纓之胄, 辅相蒙段, 代不乏贤。

曾祖讳陇, 任元签事之职, 镇守大理上关。

祖讳隆, 性乐善, 至诚感神, 天锡(赐)神泉, 即谓之曰: 龙淇公。公则靠天石(赐)之田, 得以灌溉。祖妣氏, 身怀有孕, 难以临盆, 因神人锡(赐)以菩提子, 使含口内, 果应, 于是下咽, 乳儿双手捧出。先祖将菩提子。送还, 神人遂驾祥云而去。先祖于是将菩提种于周城之北教场, 遂

名之曰上关花。此先祖善果栽培之力也。

显考讳保, 诰授勇略将军, 食邑千户。妣氏李, 具四德之懿行, 生子二, 长曰福, 次曰赐, 籍居老窝, 世袭土知州。

寿山公, 即长子也。……

公生于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卒之岁乃宣德乙卯七月望日也, 享寿八十有一。……

辛卯科乡进士直隶赵州高邑县知县 杨森叶榆甫拜撰

年愚弟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部河南口吏口同主事 杨禄五峰氏篆额

口孝男 德贤

立石

孙 鸾

墓主人段福为段隆之孙, 卒年宣德乙卯年即公元 1435 年, 据此推算, 段隆应为元末明初人。

第二个变体为 1959 年老歌手杨汉口述, 段寿桃收集。其主要情节为: 从前上关有一个樵夫, 领着儿子天天上山砍柴。一天, 儿媳难产, 得到山中一位老人的宝珠助产, 后来这颗宝珠不小心落在菜地里, 长出一棵木莲花。太和县官来赏花, 抢走樵夫儿媳玉珍。樵郎救出其妻, 在逃走之前, 将带来灾祸的木莲花树砍掉了^[1] (第 247-250 页)。

第三个变体是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本科生于 1985 年至周城教学实习时收集的。主要情节为: 周城青年段隆的媳妇难产, 段隆在山中遇见一位白胡子老人(山神化身), 在老人的帮助下, 段隆的媳妇不仅顺利分娩, 而且段隆夫妇还由此得到了一株舍利子花树。皇帝知道这株神树以后, 派人来抢, 周城人民忍痛砍了这株树。但当地人民又一次得到白胡子老人帮助, 挖出一股清泉, 从此再也不怕天旱^④。

第四个变体是周城人赵勤于 1994 年收集整理, 写进了《周城风物录》一书中, 主要情节为: 周城青年段隆到山上砍柴, 得到白胡子老人(山神化身)帮助而得到泉水灌田, 又得到那老人给予的舍利子而助妻难产, 但舍利子不慎被妇人吞下又解出, 后段隆种下舍利子而开出朝珠花。皇帝得悉后派来陆独将军守树, 他和士兵欺辱周城妇女, 于是周城人民组织了一支武装队伍, 与陆独将军展开了战斗, 并砍掉这棵带来灾难的奇花^[2] (第 97-99 页)。

第五个变体是我于 2000 年 4 月 9 日收集的, 周城农民书法家桂德本口述^⑤。其主要情节为: 周城青年段隆的妻子难产, 得到山神的神珠助产, 宝珠捏在婴儿手中一同娩出。后段隆将之种在地里长出朝珠树, 这个消息传到皇帝耳朵里, 皇帝派一个将军带一支部队把守这棵树, 将开出的花片和果子带回皇宫。第一次派来的将军, 每年只带回一部分花果, 其他分送给周城百姓, 所带士兵不扰民, 这位将军得到周城人民敬仰。但皇帝嫌花太少, 将他调回, 重新派一个将军来。这个将军不仅把奇树花果全部送给皇帝, 而且他带的官兵奸淫掳掠, 无所不为。段隆看到自己种的这棵树给百姓带来灾难, 便将树毁掉。那个坏将军发现树被砍了, 追究起来, 在树边挖出一个大坑, 将周城老老小小都赶到树边。这时, 段隆的儿子段宝勇敢地跳下坑, 用计谋骗得将军跟着跳入。段宝一口咬下将军的耳朵, 空中飞来一只老鹰, 叼起将军的耳朵飞走后又丢到地面, 变成了一块耳朵石。

第六个变体是随我去周城做田野工作的研究生程志君 2000 年 5 月 14 日采访杨鹤所录, 主要情节为: 周城有个人叫段隆, 每天上山砍柴为生。媳妇难产得到山神神珠的帮助, 神珠被段妻吞下又解出, 后段隆将其种下长出朝珠树。皇帝派一个将军来守护这棵树, 这个将军行为不正, 总是欺侮周城妇女, 下面的人往上告, 皇帝就把将军斩了。百姓虽然觉得这棵树好, 但也带来很多灾难, 于是就用妇女的衣服裤子搭在树上, 树受到侮辱, 终于死掉了^[3] (第 244-245 页)。

第七个变体是 2001 年 7 月 19 日在因特网上采录的^⑥, 其主要情节为: 段隆因至诚感动山神而得到泉水灌溉农田。其妻玉珍难产又得到山神的朝珠的助产, 朝珠被吞下又娩出, 后来段隆将朝珠种在地里长出朝珠花。皇帝派御林军来守花, 当地的目大爸也趁机敲诈勒索, 并将段隆妻王珍抢走。村民用狗血

将带来灾难的朝珠花浇死,段隆救出玉珍逃奔关外。

一个传说由它的所有“变体”组成,根据普洛普的理论,在传说中,人物的功能(即行动)构成了传说的基本成分,这种具有结构意义的功能就是通常所说的“母题”^⑦。上述变体的“母题”列表如下:

朝珠花人物及母题(人物行动)表

序号	采集者	主人公	收集时间	母 题													
				段隆得水	段隆得珠	段妻吞珠	段隆种树	好将军守树	坏将军守树	皇帝斩坏将军	段隆毁树	周城武装反抗	段子献身	耳朵石遗留	段隆夫妇逃亡		
1	杨森	段隆	1435年	▲	▲	▲	▲										
2	段寿桃	樵夫	1959年		▲		▲		▲		▲						
3	人大师生	段隆	1985年	▲	▲		▲		▲		▲						
4	赵勤	段隆	1994年	▲	▲	▲	▲		▲		▲	▲					
5	朱炳祥	段隆	2000年		▲	▲	▲	▲	▲		▲			▲	▲		
6	程志君	段隆	2000年		▲	▲	▲		▲	▲	▲						
7	网络本	段隆	2001年	▲	▲	▲	▲		▲		▲						▲
备注	(1)变体2中“得珠”及“种树”皆为樵夫之行动。 (2)▲黑三角表示各个变体的“母题”。																

二

上述7个变体前后间隔500多年。15世纪的传说讲的是一个至诚感神终得好报的故事,并未涉及国家与地方民族社会之关系。古代统治者对于边陲少数民族的政策是,只要以朝贡形式承认中央王朝,国家政权对当地的经济、政治、文化、风俗并不干涉,此谓之“羁縻”^⑧。唐宋时期,中央政府对民族地区实行羁縻政策,任用当地首领进行管理与统治。元明至清初,中央政府在民族地区实行土司制度,国家的控制虽有所加强,但主要涉及的是上层的领属关系,并没有干涉民族社会的文化传统,统治阶级的国家意识形态亦未成为民族地区的民间世界观。乡村社会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文化上皆是一个自足的社会,保存着自己传统的宗教。农民在现实劳作中的发现与创造,如寻出山泉灌溉农田,发现某种药物可以助产以及找到新的栽培植物的品种,皆归于神之赐与,段福墓志铭所记传说反映的就是这种状态。

但20世纪以来所采集的传说为之一变,主题成为以皇帝为代表的国家权力的掠夺性下沉造成的灾难性后果以及村民的反抗。从明初至今500多年中,其间国家政治对于云南边陲的少数民族地区有三次重大的权力下沉。第一次是清雍正年间的“改土归流”,朝廷在云南、贵州等省推行“废土官、置流官”的制度,设置府、厅、州、县,委派官员进行统治,实行与汉族地区相同的政治制度。此时王权已达于县政,但亦止于县政。第二次是清末新政至20世纪上半叶,这被称之为国家政权建设(state-making)或现代民族国家的建设,此时国家政治权力进一步下沉。这一次下沉脱却以往几千年的旧规,国家体制性权力由县逐步延伸到乡镇,“乡成为直接面对农民的基层政权机构,并直接管辖着村。”^[4](第8页)第三次是20世纪中叶中国革命成功以后,国家权力继续下移,通过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生产队、生产大队等集体化组织形式深入到村队和家庭之中。改革开放至村民自治以前,村公所始终是乡政府的派出机构,其与乡政府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显然,国家权力已经下延到了村一级。在中国,包括少数民族地区,“村落家族文化是中国乡村传统的组织特征和文化特征”^[5](第2页)。于是国家政权的下沉所造成的与民族社会之间的张力,主要不是体现在中央与民族地方政府政权机构之间,而是体现在国家权力与村落“文化网络”之间。由于封建国家和现代民族国家皆拥有“跨越性暴力垄断”^[6](第345页),它可以实行强

制性的牵动,运用暴力手段占有地方资源,国家与民族社会之间就会出现过于巨大的张力而两不相容。朝珠花传说要告诉我们:这种掠夺性下沉造成了国家与民族互残互伤的灾难性后果。

在朝珠花故事中,朝珠花的命运有生成与灭亡两个大阶段。朝珠花的生成是神的赐与,其灭亡却由于皇权的掠夺。段隆遇到了神,神是自然力的象征化表达。神帮助人,表明人与自然的和谐。朝珠花开香飘万里,表明白族人民对自己的文化创造的热爱。但皇权介入后,巨大的张力产生了。皇帝派御林军来看守朝珠花,将朝珠花都弄进了皇宫里去,而且士兵在周城奸淫妇女,破坏社会生活的宁静。皇权对朝珠花的攫取、陆独将军对于周城百姓的残害,皆说明国家权力的掠夺性质,其后果只能是地方民族对国家的激烈对抗。周城人毁掉了朝珠花,皇权霸占民族资源的目的未能得逞,掠夺也只好中止,国家从中也并没有得到好处。段宝咬掉将军的耳朵,是地方民族对国家的极大的蔑视。而在变体4中这种反抗更为直接与强烈,周城人民组织了一支武装队伍,与陆独将军展开了战斗。国家权力掠夺性下沉的后果竟严重到已经打破了国家“暴力垄断”而威胁到政权本身的地步。20世纪以来收集的变体中反复申诉的“坏皇帝”、“坏将军”、“坏县官”的情结,是对皇帝权威进行反抗的意识形态表述,是对集权所造成的国家对于民族文化传统的破坏作用所形成的巨大张力的表述。传说在这里说明的是:在激烈的对抗中,地方民族文化与国家文化只能是两败俱伤。耳朵石的鉴戒意义在于:它既是地方文化反抗国家文化取得胜利的骄傲的见证,又是国家权力掠夺性下沉遭到失败的耻辱的见证。

但在变体5中,《朝珠花的传说》却有着双重的主题,即故事增设了两个母题:一是好将军守树,二是好皇帝斩坏将军。这个好将军、好皇帝分别与坏将军、坏皇帝对立。好将军守树得到周城人民的敬爱。传说在将好将军与坏将军进行强烈的对比中,鲜明地提出并辨证地回答了如下的问题:国家文化与民族文化并非绝对地对立,它们可以共存互补;只要国家并不极端伤害地方民族的利益,这种权力“下沉”就有可能被接受。好将军的到来,作为采集民族文化以及传播国家文化的双重象征,他被周城人所接受。反之,坏将军在接触民族文化之花时采取了“全部占有”的态度,越过了周城人接受的限度,结果是地方民族宁愿用自我毁灭的方式也不愿接受国家权力的压迫、欺凌与亵渎,这种毁灭包括毁灭本民族的文化资源、毁灭自己民族的优秀儿女。《朝珠花的故事》刻意渲染铺陈坏将军的恶行,是为了从否定的角度逼出肯定的结论,并警示国家统治者在处理国家与民族的关系特别要看到反面的恶果,这是《朝珠花传说》行文上的一个策略,也是一种民间的智慧。这个变体中的“好皇帝”的形象是意味深长的,它与第4个变体中的武装反抗一起,从正反两个方面反映了周城知识精英对国家权力下移的态度。

三

如果从空间维度转到时间维度,我们看到,国家与地方民族社会之间的张力,就20世纪以来而言,也体现为国家所代表的现代文化与民族社会的传统文化之间的张力。

作为白族传统文化的朝珠花传说,在被拉动过程中,总是不断地在寻找适应现代化的方式,以达到与时俱进的目的。于是,朝珠花的传说的历史发展便成为一个不断“建构”的过程。这个“建构”过程以结构主义的理论就难以解释。在白族朝珠花的故事中,“登场人物的名字”发生变化的只有段寿桃采集本一例,即将段隆置换为樵夫,皇帝置换为县官,段妻置换为儿媳;而在其余6个变体中人物都没有变。而普洛普认为不会出现变化的作为结构研究基本成分的“母题”(人物的行动和功能)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最初的段福墓志铭中,只有4个母题,即“得水”、“得珠”、“吞珠”、“种树”,而在后6个变体中共有12个母题,增长到原来的3倍。新增的母题中,最重要的是“坏将军守树”和“段隆(第二个变体中为樵夫)毁树”这两个关键性的母题,6个变体中都有这两个母题。这些变化都是时间过程中发生的,时间对故事重新进行了建构,进而影响到神话的主题的改变。也就是说,民间故事在流传过程中是不断进行着自身的再生产的。我们所说的“传统”并不是封闭式的,它是一个开放的系统,不断吸纳新的时代精神而重铸自身。从这个意义上说,传统与现代是无法区分的,正如生物体一样,今日之细胞已非昨日之细胞。

在这个理论视角之下,便能理解现代民族国家的文化是可以与传统的民族社会文化结合起来的,其间并不存在着鸿沟。我们并不是说要消除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张力关系,而是说使这种张力关系成为传统进入现代、适应现代、与时俱进的变迁与发展。《朝珠花的传说》在这种张力关系中如果不出现适应性变迁,它就不能成为当代的传说。传统与现代在这种张力关系中的“结合”,被研究者们称为“传统的复兴”,这一说法表明了对传统的当代化认识,以及对传统与现代对立关系的消除。

然而,这个认识的获得是经历了一个历史过程。在20世纪的上半叶及下半叶的“文化大革命”中,这种传统与现代的张力关系有时只被视为对立关系,不看作整合关系。总认为国家所代表的现代文化是先进文化,民族传统文化特别是民族宗教文化是落后的文化,于是采取逐步限制直至消灭的政策。允许民族文化存在并不是从根本上对于其价值的深刻认识,而只是暂时的统治策略。这使国家与社会同时在经济与文化两方面付出了昂贵的代价,不仅国家没有富裕,文化发展的多样化也被取消。直到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国家政权不仅对这一世纪上半叶的权力下沉有着一种批判性反思,而且对50年代至70年代的文化形态的统一化、经济体制的集体化亦有着自我批判的反思。在反思中所制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大大缓和了国家与地方民族社会的对立关系,同时保持了民族传统在国家现代化经济文化建设中的被牵引的合理的张力关系。国家的利益与民族的利益在这里得到了一致性的表述,传统与现代也得到了一致性表述。在新的历史时期内周城对于朝珠花传说的“文化再生产”,其意义正在于围绕着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线,牵动周城乃至白族的旅游业的发展。周城村属大理市喜洲镇,位于著名的蝴蝶泉边,是“五朵金花”的故乡。这是一个有着2101户、9039人、年总纯收入为16228万元^①的超级村庄,1999年该村被中国村社促进会授予“中国经济特色村”称号,同时该村被地方社会公认为保存白族传统文化较为完好的村庄。周城人有着“上下五千年乾坤再造,纵横八万里巨龙腾飞”^②之志,朝珠花的故事是他们实现这个志向的重要手段。2000年底,他们在北区依傍蝴蝶泉的棕树河一带开出了一片新的宅基地,将前面一片空旷的场地重新命名为“朝珠广场”,计划发展一个民俗旅游村,在那里增竖了一个史无前例的、运用现代化点火装置的特大火把。在我与同事们主编的《周城文化——中国白族名村的田野调查》一书发行仪式后,晚上在“朝珠广场”举行了大型歌舞晚会,并邀请了各级领导来参加,那天晚上来周城观光的中外游客数以万计。在我今年2月回访周城时,这些计划已付诸实施,他们利用各种资源开展工作,朝珠广场的民俗旅游村建设已经得到大理市、云南省乃至国家某些部委的认可与支持,认为周城是“旅游大村”建设的榜样。可见周城是一个得到国家与地方民族社会双重承认的村庄。这表明,只要不将民族传统与国家现代化对立起来,而是合理利用张力关系进行牵引,民族社会是可以按国家现代化的要求协调发展的。

四

在民族—国家的发展特别是现代化建设中,国家权力下沉,国家对地方民族的影响是必然的趋势,于是形成国家与民族社会之间的“时空张力关系”。张力关系包含着对立关系、并置关系、交融关系和整合关系等,本文的研究目的是要避免对立关系,而探讨并置关系、交融关系与整合关系的条件,亦即探讨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张力关系的适度范围,在这个范围之内,民族地区的乡村社会可以跟随国家现代化步伐而出现稳定性变迁或转型。本文的结论有如下两点:

1. 国家与民族社会之间的张力在空间维度上的度量: A. 当国家权力掠夺性下沉时,民族地区的资源由国家独占,国家权力侵害民族地区人民的生命财产,国家与地方民族之间就形成对立关系,其后果是激起地方民族的反抗,造成资源的破坏、国家的动荡与社会的不稳定。 B. 当国家权力非掠夺性下沉时,国家尊重地方民族文化资源并与之共享,国家与民族之间的社会文化形成并置关系、交融关系和整合关系,民族社会在张力中被牵动而发展,国家与民族之间良性互动、和谐发展。

2. 国家与民族社会之间张力关系在时间维度上的度量: A. 当国家排斥民族传统文化,国家与民族

社会就形成对立关系,现代化必因失去各民族传统文化基石而遭受挫折。B. 当民族传统得到尊重,国家现代化与民族传统文化接合,形成并置关系、交融关系和整合关系,民族传统文化的性质、功能皆发生转换,并为国家现代化目标所牵引,民族社会良性运行。

注 释:

① 本文的研究属于定性的研究而非定量的研究。

② “变体”指神话传说的各种讲法。

③ 2000年1月至2001年2月,我在周城做了为期整一年的田野工作,该年4月6日(农历三月三日)我参加周城“三月三”节,在苍山脚下的周城段氏龙王庙中抄录了被砌入庙墙后壁的明代段福墓志铭,其中有关于段隆的传说。

④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云南大理周城志稿》编写组. 云南大理周城志稿. 内部资料本, 1984.

⑤ 随我去周城做田野工作的研究生程志君2000年4月14日也采访了桂德本,所讲故事内容大致相同。她的采集稿编入了我与同事主编的《周城文化——中国白族名村的田野调查》,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41-244页。

⑥ 网址为: <http://travel yn. cninfu. net>.

⑦ 参见叶舒宪编选:《结构主义神话学》,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6页。

⑧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记载蜀地二十七位耆老、大夫、荐绅言:“盖闻天子之於夷狄也,其义羁縻勿绝而已”。

⑨ 此为周城1999年12月31日上报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摘自周城年报表。

⑩ 此为周城办事处2000年所贴柱联。

[参 考 文 献]

[1] 大理白族自治州文化局. 白族民间故事选[M].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4.

[2] 赵 勤. 大理周城风物录[M]. 德宏: 德宏民族出版社, 1994.

[3] 郝 翔, 朱炳祥, 等. 周城文化——中国白族名村的田野调查[M].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1.

[4] 于建嵘. 岳村政治[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1.

[5] 王沪宁. 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

[6] [德] 诺贝特·埃利亚斯. 文明的历程[M]. 袁志英译. 北京: 三联书店, 1999.

(责任编辑 于华东)

Measurement of Tension

ZHU Bing-xiang

(Wuhan University Law School,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Biography: ZHU Bing-xiang (1949-), male, Professor, Wuhan University Law School, majoring in social-cultural anthropology.

Abstract: Myth and legend is a kind of symbolic expression of the essence of human beings. The tension relation between states and ethnic societies, reflected from the Chaozhuhua legend of Bai People, expresses as follows: from the dimension of space, states and ethnic societies are at confrontation by hurting and impairing each other, when the power of states takes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ggressive declination; on the contrary, states and ethnic societies are at integration with harmonious and interactive development. From the dimension of time, states and ethnic societies are also at confrontation with the departure of tradition and modernization, when modern states rule out the traditions of ethnic culture; on the other hand, states and ethnic societies are also at integration, when ethnic traditions adapt to the modern development of states.

Key words: states; ethnic societies; tension; measurement